

苏轼与孙觉交游考述

——从《潇湘竹石图》说起

周云容

(眉山三苏祠博物馆,四川眉山620010)

摘 要:苏轼《潇湘竹石图》卷末端题有“轼为莘老作”五字款识。明代庐陵吴勤提出此“莘老”即为孙莘老。孙觉是苏轼一生的挚友,嘉祐相识,熙宁相知,元丰同患难,元祐表里相依。二人友谊笃厚之缘由,主要在于相互仰慕、志趣相投与人事渊源。

关键词:苏轼;莘老;《潇湘竹石图》;交游

中图分类号: I206.2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673-1670(2019)06-0092-06

2018年11月佳士得香港以4.636亿港元的成交价拍出苏轼的《枯木怪石图》,创下苏轼作品的拍卖最高价纪录,也是迄今为止佳士得香港拍出的最高价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。苏轼的画作再次引起人们的热议。苏轼是文人画发展史中坐标性的人物,但其画作多见于著录,传世真迹公认的不超过三幅。中国美术馆收藏的《潇湘竹石图》被认为是苏轼画作真迹之一。《潇湘竹石图》卷末端题有“轼为莘老作”五字款识。五字题款语言简练、亲切,传达出苏轼与莘老之深厚情谊。本文拟以《潇湘竹石图》为线索,探究苏轼与莘老的交游。

一、莘老是谁?

《孟子·万章》曰“伊尹耕于有莘之野,而乐尧舜之道焉。”东汉经学家赵岐注曰“有莘,国名。伊尹初隐之时,耕于有莘之国。”伊尹,名挚,曾耕于莘之郊野,隐居乐道,被称之为“莘老”。伊尹之道德学问、经济事功俱全,为世人所仰慕。“古者,名以正体,字以表德”,故后世之人崇尚以“莘老”或以为名,或以为字,名“挚”者益夥。仅《宋史》有传者中,即有孙觉(1028—1090),字莘老;刘挚(1030—1097),字莘老;杜莘老(1107—1164),字起莘。还如元代文学负有盛名的卢挚(1242—1314),字处道,一字莘老。

笔者考察,与苏轼同时代,有交游之“莘老”者有孙莘老、刘莘老二人。据《宋史》本传载:孙莘老,即孙觉(1028—1090),字莘老,高邮(今属江苏)人。少从胡瑗受学。仁宗皇祐元年(1049)登进士第。嘉祐中,选为馆阁校勘。神宗即位,直集贤院,擢右正言。熙宁二(1069)年,召知谏院,同修起居注,知审官院。初与王安石善,后论事不合,出知广德军,徙湖州,移庐州。历知苏、福、亳、扬、徐诸州。知应天府,人为太常少卿,易秘书少监。哲宗元祐时,兼侍讲,迁右谏议大夫,迁给事中,除吏部侍郎,擢御史中丞。元祐五年(1090)卒,年六十三。绍圣中,以觉为元祐党人,夺职追两官。徽宗即位,复官职。觉有德量,为王安石所逐。安石退居钟山,觉枉驾道旧,为从容累夕;迨其死,又作文以诔,谈者称之。有《文集》《奏议》六十卷,《春秋传》十五卷^{[1]10925-10928}。

刘莘老,即刘挚(1030—1097),字莘老,永静东光(今属河北省)人。嘉祐四年(1059)甲科进士,为冀州南宮令,颇有政绩;徙江陵府观察推官。熙宁三年(1070),经韩琦所荐,补馆阁校勘,迁著作郎,权检正吏房公事,擢监察御史里行。初为王安石所器重,因上书论新法之弊,被谪。哲宗元祐时,擢侍御史,累迁尚书右仆射。绍圣中,连贬鼎州团练副史、新州安置。绍圣四年(1097)病卒

收稿日期:2019-06-21

作者简介:周云容(1979—),女,四川省乐山市人,历史学硕士,眉山三苏祠博物馆馆员,主要从事三苏文化研究。

于贬所,年六十八,谥号忠肃。性刚直,有气节,通达明锐,触机辄发,不为利怵威诱。嗜学,老不释卷,有《忠肃集》^[1] 10849-10858。

孙莘老、刘莘老都素有文名政声,在熙宁变法中因屡述新法之弊而遭贬谪或排挤,被“新党”视为“旧党”;在“乌台诗案”中,因收受苏轼讥讽文字被罚铜;元祐年间,还朝执政;哲宗亲政后又再次贬黜。此二人与苏轼有较大交集,且经历颇为相似,更易产生情感上之共鸣,故其交往存在可能性,苏轼赠之以画存在合理性。

《潇湘竹石图》是苏轼为孙莘老作还是为刘莘老作?第一个给出论断的是《潇湘竹石图》第七位跋者明代“庐陵吴勤”,其跋诗中写道“坡仙昔在黄州时,居闲每访孙莘老。竹石曾将写赠之,遗墨到今真是宝。”他明确提出此画为苏轼在黄州时赠予孙莘老的墨宝。吴勤(1330—1405),字孟勤,庐陵人,居永新,少负英名,明洪武初年试经学第一,除武昌教授、开封府教授,召入史馆,门生满天下。著有《巨山樵者集》《黄鹤山樵集》《幽翁集》《六义斋集》。时人评价吴勤“以诗名当世,字有晋人风格,不择纸笔,俱得其妙”^[2]。因其声望,吴勤这一论断为后人考证苏轼作品上“轼为莘老作”的落款提供了依据。《潇湘竹石图》第十二位跋者明朝永乐年间靖江王府教授“豫章包彦肃”,其文曰“图之末,公自书‘轼为莘老作’五字,莘老姓孙氏,是公之故人也。”他也认同此画乃苏轼为孙莘老所作。

按吴勤之说,苏轼贬居黄州期间常访孙莘老,作画以赠之,事实是否如此呢?元丰二年(1079)十二月,因“乌台诗案”陷狱的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,不得签书公事。“安置”是宋代官员黜免处罚之一,被处以“安置”的犯官其活动是受到监视和限制的。苏轼元丰三年一月到达黄州,元丰七年四月上旬离开,谪居黄州五年有余。其间,偶尔至周边武昌等地访友、短暂停留外,再无远行。据清茆泮林《宋孙莘老先生年谱》载,孙莘老元丰二年七月知福州,元丰四年徙知徐州,元丰五年诏知应天府,元丰六年入为太常少卿,易秘书少监。黄州属淮南西路,福州属福

建路,徐州、应天府属京东西路,路途相距遥远。孙莘老北上赴徐途中是否绕道黄州与苏轼相晤,史料不载,即便有,也极为短暂。据此推断,吴勤跋诗中的“坡仙昔在黄州时,居间每访孙莘老”实为不确。

而今,已无从考证吴勤论断《潇湘竹石图》“轼为莘老作”之“莘老”为孙莘老之依据,但从元祐年间苏轼与刘莘老的交往看,此时作为朔党领袖的刘摯,虽为苏轼昔日好友,却欲借党争打压苏轼。林语堂先生在《苏东坡传》中称刘摯“独立批评者,后与东坡为敌”。而孙莘老则被称为“东坡密友”“毕生的友人”。在此,从情感上,姑且认同吴勤之论断,《潇湘竹石图》所题“轼为莘老作”之“莘老”为孙莘老。

二、苏轼与孙觉之交往述略

苏轼与孙觉的交往,从其诗文及年谱中可了解其大概。两人可能相识于嘉祐年间,熙宁年间因反对新法而遭排挤外任,一度同在两浙路任职,交往频繁密切。元丰年间因“乌台诗案”苏轼遭贬谪,孙觉也受此牵连,两人关系并未因此而生罅隙,反而身远心近,元祐年间两人还朝共事,表里相依。

(一) 相识

苏轼与孙觉的交往始于何时,两人诗文及年谱不见确切记载。从两人的经历推断,两人的直接会面应不早于嘉祐五年(1060)。嘉祐元年、二年,苏轼赴京师科考时,孙觉为宣州太平县(今属安徽)县令,不在京师。嘉祐四年正月,孙觉诏编校昭文馆书籍回京师,而苏轼因丁母忧还蜀居眉。嘉祐五年二月,苏轼除服还京,寓居怀远驿准备制科考试,时孙觉仍在京师任职,两人有可能会面于此时。同为壮志凌云的青年才俊,苏轼与孙觉谈古论今、作诗为文,遂为友人。

(二) 相知

熙宁年间,王安石变法,政局纷攘。苏轼对变法本身持有不同政见,加之新法的弊端以及其与欧阳修、韩琦、富弼等的渊源关系,苏轼站到了反对变法的一边,孙觉对新法也是反对的。因反对变法,两人遭排挤而外任地方。相同的政治见解,相似的政治处境使两人从“故友”而成“密友”。

苏轼作与孙觉的诗文,现存最早的是《宿余杭法喜寺,寺后绿野亭,望吴兴诸山,怀孙莘老学士》。吴兴,古郡名,宋时即为湖州。其诗作于熙宁五年(1072)七月七日,时苏轼倅杭,孙觉知湖州。杭州、湖州属两浙路,据《元丰九域志》载,杭州北自界首至湖州九十里。余杭位于杭州西北,与湖州相隔百里,但山川相连,苕溪相通。在绿野堂上远眺,隐约可望,因起怀旧之感。苏轼诗云“烹鱼得尺素,好在紫髯翁”。三国孙权被称作紫髯将军,孙觉亦姓孙而多髯,李廌《师友谈记》中记载:“馆中以孙莘老为大髯孙学士,(孙)巨源为小髯孙学士”,故苏轼戏称孙觉为紫髯翁。在苏轼诗文中,多次述及孙觉多髯,如《欲往湖州,见孙莘老,别公辅、希元、彦远、醇之、穆仲》:“秋来欲见紫髯翁,待到梅花细萼红。”《送孙勉》:“更被髯将军,豪篇来督战。”自注云“其兄(即孙勉之兄)莘老。”又《次韵秦观秀才见赠,秦与孙莘老、李公择甚熟,将入京应举》:“一闻君语识君心,短李髯孙眼中见”,“髯孙”即孙觉。《宋史·孙觉传》等史料不载孙觉之相貌,但从苏轼诗文,依稀可见其高大、多髯之貌,豪放、旷达之神。

十一月,苏轼受命将往湖州督管堤堰工程。据《宋史·孙觉传》载,孙觉知湖州,修松江堤,高丈余,长百里。施宿《东坡先生年谱》云“此时东坡‘以转运司檄,监视开运盐河,之湖州相度捍堤利害’。”苏轼为即将见到日思夜想之友人而兴奋不已,相继作有《将之湖州戏赠莘老》《用将之湖州戏赠原韵寄莘老》(或名《再用前韵寄莘老》)《欲往湖州,见孙莘老,别公辅、希元、彦远》等诗文。

十二月,苏轼至湖州,好友久别重逢,相处甚欢愉。孙觉在湖州政事之余,“网罗遗逸,得前人赋咏数百篇,以为《吴兴新集》,其刻画尚存而僵仆断缺于荒陂野草之间者”^{[3]484},建墨妙亭以藏之。苏轼对孙觉此做法极为赞赏,曰“吴兴太守真好古,购买断缺挥缣缟”“后来视今犹视昔,过眼百年如风灯。他年刘郎忆贺监,还道同时须服膺”^{[4]81}。以刘郎(即刘禹锡)喻后人,以贺监(即贺知章)喻孙莘老,言后人若见孙之遗迹,定当敬佩其学问文章及治绩。苏轼遂为其作《墨妙亭记》以记之,并

将其珍藏的《羊欣帖》摹本“以遗吴兴太守孙莘老,使刻石置墨妙亭中”^[5]。羊欣,东晋、南朝宋书家,得王献之亲授书法,时人以为子敬(王献之字)之后可以独步,故谚曰“买王得羊,不失所望。”苏孙两人公余之暇,与故友新知畅游湖州,相互唱和,留下了数十首诗词作品。苏轼为孙觉修葺的天庆观以“归雁亭”名之,并作《莘老葺天庆观小园,有亭北向,道士山宗说乞名与诗》。据《石林诗话》卷中载“熙宁初,时论既不一,士大夫好恶纷然。”“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,退而与宾客言,亦多以时事为讥消”,表兄文同“每苦口力戒之,子瞻不能听也”^{[6]611}。苏轼出为杭州通判,文同又作诗送劝曰“北客若来休问事,西湖虽好莫吟诗”;恩师张方平亦作诗劝诫苏轼“地邻沧海莫东望,且作阮公离是非”。在湖州,苏轼与孙觉及在座诸客约定“若对青山谈世事,当须举白便浮君”。白,即大白,酒杯名。浮,罚酒。如有言及时事者,罚酒一大盏。面对孙觉这样的密友,对心中不平事“如蝇在食,不吐不快”的苏轼又怎能不推心置腹呢?苏轼《赠孙莘老七绝》曰“嗟予与子久离群,耳冷心灰百不闻”“作堤捍水非吾事,闲送苕溪入太湖”,说是回避不谈时事,其实已说尽。以上诗句皆在“乌台诗案”中被检举。

熙宁六年正月一日,苏轼作《元日次韵张先子野见和七夕寄莘老之作》以怀孙觉。三月,孙觉移知庐州,苏轼作《次韵孙莘老见赠,时莘老移庐州,因以别之》赠别。诗云:

我本疏顽固当尔,子犹沦落况其餘。
 羹黄侧畔难言政,罗赵前头且眩书。(莘老见称政事与书,而莘老书至不工)惟有
 阳关一杯酒,殷勤重唱赠离居。^{[4]137}

苏轼与孙觉皆因与王安石相左被贬地方,苏轼自嘲是“顽固当尔”,对孙觉的“沦落”感到惋惜与不平。尽管有诸多的不满与无奈,也只能“惟有阳关一杯酒,殷勤重唱赠离居”,苏轼与孙觉的深厚情谊可见一斑。

熙宁七年九月,苏轼移知密州,途经高邮,与时居祖母丧在家的孙觉会晤。孙觉曾出杜君懿所蓄许敬宗砚,并将此砚赠之与苏轼。据苏轼《书许敬

宗砚二首》叙杜叔元(字君懿)藏唐许敬宗砚,苏洵“欲求其砚而不可”。“君懿既死,其子沂以砚遗余(苏轼),求作墓铭”,苏轼辞之。杜沂乃求孙觉而得志文,遂以砚归莘老。“余(苏轼)过高邮,莘老出砚示余,曰‘敬宗在,正好棒杀,何以其砚为。’余以谓憎而知其善,虽其人且不可废,况其砚。乃问莘老求而得”^{[3]570-571}。

熙宁九年十二月,苏轼罢密州任。熙宁十年二月改知徐州。元丰元年(1078)三月,苏轼与孙觉有《和孙莘老次韵》,时孙觉服除后知苏州。诗有云“虽去友朋亲吏卒,却辞谗谤得风谣”,直言不讳地说外任州府之职,虽远离友朋,但也远离朝廷的“谗谤”,也能了解地方风土民情之歌谣。又云“明年我亦江南去,不问雄繁与寂寥”,期望等到明年徐州任满后,能到江南地区任职,不管是大郡,还是小州,都会赴任,只因离孙觉近也。纪昀在《纪评苏诗》卷十六评价此诗“露骨太甚”。

(三) 相惜

苏轼对朝廷新政不满,直言敢谏却不被采纳,只得将牢骚与愤懑表达于诗文中。在元丰二年(1079)七月,朝廷以“谤讪朝政”的罪名将苏轼逮捕入狱。苏轼与孙觉直言不讳的诗文往来便是其罪状之一。据宋朋九万《东坡乌台诗案·供状》言“(苏轼)登科后来入馆,多年未甚进擢,兼朝廷用人多是少年,所见与轼不同,以此撰作诗赋文字讥讽,意图众人传看,以轼所言为当。轼与张方平……孙觉、李常……相识,其人等与轼意相同,即是与朝廷新法时事不合及多是朝廷不甚进用之人,轼所以将讥讽文字寄与”^{[6]1154}。时知福州的孙觉也因“收受讥讽文字”而罚铜二十斤。

苏轼对君王的忠心、对国家的忧虑,被群小诬陷而冠上“交通戚里”“讥讽朝政”罪名,自己却有口难辩,还连累众多友朋。其间的痛苦、忧郁和恐惧不言而喻。苏轼在《答李端叔书》中说:

得罪以来,深自闭塞,扁舟草屨,放浪山水间,与樵渔杂处,往往为醉人所推骂,辄自喜渐不为人识。平生亲友,无一字见及,有书与之,亦不答,自幸庶几免矣。^{[7]372}

苏轼以不为人知而高兴,以亲朋友人不愿与之交往而庆幸,其恐惧之情与其处境可见一斑。苏轼滴黄,与孙觉的感情并未因其贬谪或受其连累而疏远,反而在患难之中见得真情。

元丰三年二月,苏轼到达贬谪地黄州。滴黄期间,在《苏轼文集》中虽不存苏轼与孙觉书信,但在现存苏轼与其他友人书信中,可了解两人的往来频繁密切。

元丰三年冬,秦观致孙觉简,并谈家事及苏轼迁谪黄州近况。秦观与孙觉有戚谊,秦观在信中称孙觉之妻为“姨婆”。秦观《与孙莘老学士简》云:

苏黄州虽不得书,然昨苏子由著作过此,及南来士大夫,具云在黄甚能自处,不以迁谪介意,日但杜门蔬食,诵经读书而已。昔之论者常患才高太锐,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。^{[8]998}

秦观在与孙觉的信中谈及苏轼近况,可见孙觉对苏轼近况是十分关心的。

元丰四年十月左右秦观作《与苏公先生简》第四首云:

莘老云,有两书托公择寄去,不知曾有书去否?渠云“非求答,但欲知达否尔。”昨过此不多日,然相聚甚款,未尝无一日不数十次及公昆仲也。虽不求扬州,为公作黄楼主人,亦是吾党中一段佳事。^{[8]991-992}

元丰四年,孙觉辞扬州命而改知徐州,在赴徐州途中与秦观相聚,未尝无一日不念及苏轼兄弟数十次,可见孙觉对苏轼的挂念。辞扬州而知徐州,只为苏轼作黄楼主人。孙觉与苏轼的书信托李常(字公择)寄与。李常,黄庭坚之舅父,与苏轼、孙觉为至交好友,与孙觉有儿女姻亲关系,李常长女适孙觉子端,黄庭坚为孙觉婿。黄州属淮南西路,时李常为淮南西路提点刑狱,驻于舒州。苏轼滴居黄州时,李常曾多次至黄州与苏轼相会。苏轼在《答秦太虚书(四)》中就有“公择近过此,相聚数日”之载。孙觉托李常寄书与苏轼,实在情理之中。苏轼在《与李公择(十三)》中有“莘老必时得书,在徐乐乎?”该书信应写于元丰四、五年间,其

时孙觉已知徐州,可知苏轼亦有书寄与孙觉。

元丰五年二月,苏轼在《答李昭玘书》中还说:

徐守莘老每有书来,亦以此见教。想时相从,有以发明……徐州城外有王陵母、刘子政二坟,向欲为作祠堂,竟不暇,此为遗恨。近以告莘老,不知有意作否?^{[7]379}

李昭玘“少与晁补之齐名,为苏轼所知。擢进士第,徐州教授。守孙觉深礼之,每从容讲学及古人行己处世之要,相得欢甚”^{[1]10998}。从中可知苏轼与孙觉书信往来频繁,苏轼还将自己徐州任上未了之事托付孙觉。

元丰六年夏,苏轼患“疮疖、赤目”,杜门不出,外界甚至传言其病至死,病初愈后,闻故人李常“召为太常少卿,迁礼部侍郎”,孙觉知徐后“知应天府,入为太常少卿”,遂作书与李常,曰“公择、莘老进用,皆可喜”^{[7]437},为二人被召还朝廷而欣喜,遂作书称贺。

元丰七年正月苏轼量移汝州,四月离黄,十二月抵泗州。元丰八年正月,滞留泗州的苏轼收到孙觉寄来的墨,遂作《孙莘老寄墨四首》以谢之。据施宿《东坡先生年谱》注引李端叔跋此诗云“孙莘老作字至不工,每得佳墨,必怅然思见东坡。方时初入讲筵,例有所赐,乃以为寄尔”。苏轼爱墨尽人皆知,孙觉每得好墨,多赠予苏轼。苏轼对孙觉赠墨的感激与欣喜跃然纸上。《孙莘老寄墨四首》其四云:

吾穷本坐诗,久服朋友戒。五年江湖上,闭口洗残债。今来复稍稍,快痒如爬疥。先生不讥诮,又复寄诗械。幽光发奇思,点黠出荒怪。诗成自一笑,故疾逢虾蟹。^[9]

谓本因以诗得罪,经朋友劝诫久不做诗。今先生不讥笑嫌弃,反而赠作诗之用具——墨,又诱发了诗兴。

(四) 相守

元丰八年十二月苏轼以礼部郎中召还就任。苏轼还朝,亦有孙觉举荐之功。据《太平治迹统类》卷十八《宣仁垂帘听政》元丰八年六月纪事:

“范纯仁、吕大防、王岩叟、王存、孙觉又荐赵君锡、李常、晏知止、范纯礼、胡宗愈、韩宗道、梁焘、苏轼、朱光庭、苏辙。”^{[6]1595}元祐年间,苏轼与孙觉共事。随着“元祐更化”,党争日渐激烈,既有新旧党之间的明争暗斗,又有旧党内部的争权夺利,政治关系犬牙交错。面对洛党、朔党、新党的攻讦,孙觉始终支持苏轼,常共署名上奏,在激烈的党争中同进退。

元祐元年、二年,苏轼与孙觉等同上《议富弼配享状》,议以富弼配享神宗;同荐朱长文(字伯原,苏州吴人,人称乐圃先生)差充苏州州学教授,荐常安民(字希古)擢大理鸿胪丞荐,奏乞录用郑侠(字介夫)、王焄,荐陈师道为徐州州学教授;上书奏请留知蔡州的刘敞于京师,留天章阁待制、河北都转运使顾临于朝。元祐三年,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知贡举,主持进士省试。吏部侍郎孙觉、中书舍人孔文仲同知贡举,为苏轼之副。两人共署名上《奏巡铺郑永崇举觉不当乞差晓事使臣交替》《奏劾巡铺内臣陈慥》《申明举人卢君脩王粲等》《论特奏名》《乞裁减巡铺兵士重赏》《乞不分经取士》《乞不分差经义诗赋试官》《乞奏御试放榜馆职皆侍殿上》等奏状。可知,在元祐时期的党争中,孙觉是坚定地站在了苏轼一边,用实际行动支持苏轼,与苏轼表里相依。

三、苏、孙友谊坚定缘由探析

北宋党争激烈,政坛纷扰。苏轼与孙觉之相交能得以始终,个中原委可作探讨。

(一) 相互仰慕

苏轼与孙觉的交往源于两人间的相互仰慕。嘉祐年间,三苏父子名震京师,苏轼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“老夫当避路,放他出一头地”的高度赞誉,仁宗皇帝亦有“两宰相”之权威预言。孙觉经学湛深,尤长于《春秋》,嘉祐年间已为名士,“仁宗择名士编校昭文书籍,觉首预选进馆阁校勘”^{[10]2212}。两位风华正茂、前途似锦的年轻人(孙觉长苏轼八岁)因相互仰慕而结识、定交实为一雅事。其后,苏轼更是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,道德文章令世人称道。苏轼对孙觉评价甚高,在《孙觉除吏部侍郎》制中道“文学论议,烛知本原。谏省东

台,久从践历。”^{[11]198}在《孙觉可给事中》敕中曰:“行不违道,言不违仁;处以孝闻,出以忠显。”^{[11]131}在《赐新除试御史中丞孙觉辞免恩命不允诏》称孙觉“直谅多闻”。这虽是官样文章,但从中也可读出苏轼对孙觉的认同与赞许。两人间的相互仰慕、吸引是其友谊长存的源动力。

(二) 志趣相投

苏轼与孙觉两人性情豁达豪放,为人正直敢言。在熙宁变法中因屡陈新法之弊而遭到排挤和打击,元祐还朝,不畏权势,弹劾宰辅。历典数州,民胞物与,政绩卓著。秦观赞孙莘老曰“转守七州多异政,奉常处处有房祠。”至今高邮尚有四贤祠,祀苏轼、孙觉、秦观和王巩四贤。相同性情、志趣与从政经历,使其有着共同的话语,这是其友谊得以始终的基石。

(三) 人事渊源

说到人事渊源,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欧阳修。苏轼、孙觉均受知于欧阳修。早在庆历年间,孙觉即拜谒知扬州的欧阳修,请教读书为文之法。欧阳修告知“此无他术,唯勤读书而多为之,自工。世人患作文字少,又懒读书,每一篇出,即求过人,如此少有至者。疵病不必待人指摘,多作自见之”,“孙书于座右”^{[10]2207}。

“苏门四学士”之黄庭坚、秦观两学士,也因孙觉的引荐而入苏门。熙宁五年十二月,苏轼至湖州,孙觉出黄庭坚诗文,言“此人,人知之者尚少,子可为称扬其名”,苏轼阅后“耸然异之,以为非今世之人也”,连声赞道“此人如精金美玉,不即人而人即之,将逃名而不可得。”^{[7]472}秦观少时已结识孙觉,经常造访孙觉之室,聆听教诲,从其学经。熙宁七年(1074),苏轼由杭州通判移知密州,过高邮访孙莘老,得秦观诗词盛赞之。元丰元年(1078),

通过李常引荐,秦观到徐州拜见苏轼。苏轼作《次韵秦观秀才见赠,秦与孙莘老、李公择甚熟,将入京应举》,诗中提到“一闻君语识君心,短李髯孙眼中见”,“短李”即李常,“髯孙”即孙觉。李常也是苏轼两人的至交、知己。前面已述及,在此不赘述。李常、黄庭坚、秦观等人在宦海中与苏轼共荣辱、共进退,等人事渊源关系也是维系苏轼友谊的重要纽带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脱脱. 宋史 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7.
- [2] 朱谋噩. 书史会要续编 [M] // 卢辅圣. 中国书画全书: 第四册. 上海: 上海书画出版社, 1992: 475.
- [3] 苏轼. 墨妙亭记 [M] // 曾枣庄, 舒大刚. 三苏全书: 第十四册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01.
- [4] 苏轼.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[M] // 曾枣庄, 舒大刚. 三苏全书: 第七册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01.
- [5] 苏轼. 题羊欣帖 [M] // 曾枣庄, 舒大刚. 三苏全书: 第十三册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01: 607.
- [6] 孔凡礼. 三苏年谱 [M]. 北京: 北京古籍出版社, 2004.
- [7] 苏轼. 答李端叔书 [M] // 曾枣庄, 舒大刚. 三苏全书: 第十二册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01.
- [8] 秦观. 与孙莘老学士简 [M] // 徐培均. 淮海集笺注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1994.
- [9] 苏轼. 孙莘老寄墨四首 [M] // 曾枣庄, 舒大刚. 三苏全书: 第八册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01: 265.
- [10] 茆泮林. 宋孙莘老先生年谱 [M] // 吴洪泽, 尹波. 宋人年谱丛刊. 成都: 四川大学出版社, 2003.
- [11] 苏轼. 孙觉除吏部侍郎 [M] // 曾枣庄, 舒大刚. 三苏全书: 第十一册. 北京: 语文出版社, 2001.

(责任编辑: 孙振杰)